

多席次選舉中政黨的分合： 以台灣區域立委選舉為例*

徐永明**、陳鴻章***

《 本文摘要 》

本文探討台灣地區各主要政黨在區域立委選舉中，分裂與合作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影響。嘗試由政黨的角度出發，以1983~2001年間七次區域立委選舉，國內各主要政黨的選舉提名、席次分配及選票動員情況為分析對象。透過有效動員指標的測量、提名失誤與席次紅利迴歸模型的建立，及實際表現與最適情況模擬差異估算發現：同屬泛藍政黨集團下的各政黨，確實因為分裂而有不利的影響，且泛藍政黨集團下的政黨分裂，主要受益者為民進黨。然而，泛藍政黨集團下的政黨分裂，及跨黨合作難以形成與落實的困境，除了受到選制本身存在有利分裂因素影響外；另一個更為實質的難題，即是泛藍政黨集團下各政黨，在選票瓜分上的極度不均等及穩定度的不足。所以，造成跨越政黨分際的合作難以形成，及落實的困境。而本文所進行的無失誤模擬，及所採用的最高可當選數估算方法，提供了SNTV選制下，政黨合作的新誘因，即透過反事實的模擬（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提供了新的資訊。

關鍵詞：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政黨合作與分裂、反事實的模擬

-
- * 本文初稿發表於政治大學中山所主辦之「憲政民主與國家發展」研討會（2003年1月），感謝評論人東吳大學政治系盛治仁教授、會議參與者、三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議與指正，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91-2414 -H-001-026）的補助。
 -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科所助理研究員，台北，polymh@gate.sinica.edu.tw。
 -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壹、前言

選舉作為一個賽局，其參與者無不受限於選制的安排，並且試圖運用不同的策略，以期能獲得最大的席次利益。因此，不同的選舉制度，對於政黨體系的形成、個別政黨的提名行爲、候選人的競選行爲、選民投票行爲等，皆有不同的影響。台灣在區域立委選舉中，長期採用「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以下簡稱為SNTV選制」，此一選制因選區規模大小不同，帶給個別政黨相異的制度面優勢與限制（謝復生，1992）。例如，較大型的政黨，在沒有提名誤差的情況下，可以隨選區大小而獲得高低不一的制度性獲利。但相對地，小黨亦有相當的生存空間，對於多黨體系的發展存有制度性的誘因及空間，因此，參與的政黨面臨提名、配票等困擾（Cox and Niou, 1993）。

在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上，原本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於八〇年代中，首度面臨來自選區及議會中，組織性反對勢力（民進黨）的挑戰。隨後，更於九〇年代中、末期，一再面臨黨內分裂所造成的衝擊。這樣的發展，一方面印證在SNTV選制下，小黨有其生存空間；同時，也反映此一選制有利於大黨的分裂，亦不利於既有政黨間的整合。因此，處於此一選制下的政黨，若能有效的防止分裂，將越能在SNTV選制中獲利，反之，將處於越不利的處境。

本文的關懷是，自八〇年代中初始的政黨競爭態勢，反對勢力的整合及獨大政黨（國民黨）的分裂，對於選舉賽局的參與者會造成怎樣的政治後果。獨大政黨是否因為分裂而有不利的影響，而整合的反對勢力在獨大政黨分裂的情況下，是否有所獲利。對於這些基本的問題，本文嘗試由政黨的角度出發，以1983~2001年間七次區域立委選舉，國內各主要政黨的選舉提名、席次分配及選票動員情況為分析對象，透過有效動員指標（徐永明、陳鴻章，2002）的測量及實際表現與最適情況模擬的比較，以了解政黨的合作與分裂，在SNTV選制下所造成的影響為何。

貳、分裂還是合作？

政黨的選舉合作議題，自二〇〇一年立委、縣市長大選首度發起，且持續延燒到二〇〇二年的北、高市長大選。泛藍（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泛綠（民進黨、台聯）的對抗，及跨越政黨分際的選舉合作議題，頓時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註一）。黨際間高層的對話、互動及協商，更是媒體追逐的焦點，且政黨間的選舉合作與否，亦成

為各界解析選舉成敗的重要觀點之一。直觀上，若屬於同一政黨集團的個別政黨能充分合作，當然可以有效運用有限的選票資源，進而增加其在選舉賽局中的獲益。反之，同一政黨集團下的個別政黨，若在有限的選票資源下進行相互競爭，不但造成選票資源的浪費；同時，可能造成席次的損失，及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的相對獲益。

雖然直觀上，同一政黨集團下的不同政黨，若能進行選舉合作，將可有效增加其在選舉賽局中的獲益。然而，同一政黨集團下的各政黨能否進行選舉合作，所要考量的因素並不僅是能否因合作而增加獲益，我們必須同時考量在不同選制所存在的干擾因素，及一定的學習歷程。以台灣地區區域立委選舉，長期採用的 SNTV 選制為例，雖然此一選制因選區規模大小不同，帶給個別政黨相異的制度面優勢與限制（謝復生，1992）。例如，較大型的政黨，在沒有提名誤差的情況下，可以隨選區大小而獲得高低不一的制度性獲利。但相對地，小黨亦有相當的生存空間，對於多黨體系的發展存有制度性的誘因及空間。除此之外，若政黨在區域立委選舉能突破5%的得票門檻，亦可獲得不分區立委的席次分配。所以，在此一制度設計下，同時存在合作與分裂的誘因，且在政黨合作上，亦存有制度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因為，較小的政黨即使在部分選區無法獲得足夠的選票，但同樣可以透過提名爭取選票，以獲得不分區席次的分配，故在政黨合作上造成不利的誘因。

除了 SNTV 選制在制度上，同時存在合作與分裂的誘因，及不分區立委席次分配制度所造成不利合作的因素外。更為深刻的政黨合作難題，不外是政黨間實質合作所要面對的合作困境：在同一範疇的個別政黨，經過一定的學習歷程，雖然可能形成合作的共識，但若是各政黨於同一選票市場所瓜分的選票資源極度不均衡或無一定的穩定度，勢必造成合作的困境。在選票資源極度不均衡的情況下，小黨寧可選擇以普遍於各選區提名，以爭取選票加總突破5%不分區席次分配門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各黨選票資源瓜分不穩定的情況下，同樣造成黨際間合作談判基礎的不足，而無法進行實質的合作。所以，即使各政黨間存有合作共識，但能否實質合作仍有許多有待克服的難題。對於以上政黨分合與選制影響的理論推演，我們認為有必要透過實証資料的建立與探討，進而對政黨合作與分裂是否造成一定政治效應，及政黨間進行選舉合作所面臨的困境等，能有所驗證與了解。

參、文獻回顧

過去關於「單記非讓渡選制」探討的文獻，主要關懷的焦點有此一選制的比例性、對候選人的選舉行為、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及關於為何會有這樣的選制選擇等幾個面

向。在理論及實證上的研究，對 SNTV 選制比例性的探討，主要討論此一選制對於規模不同政黨的影響，而其研究焦點，是分別從政黨選舉操作、制度本身機械性作用等面向進行探討（Lijphart, Lopez Pintor and Sone, 1986；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謝復生，1992；Cox and Niou, 1993；黃德福，1994；Cox, 1996；徐永明，2002；徐永明、陳鴻章，2002）。另一方面，則是針對 SNTV 選制對候選人的選舉行為、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為主的探討（王業立，1991、1999；Hsieh, 1996；Liu, 1999；黃秀端，2000）。此類研究，主要探究 SNTV 選制下的選舉行為、制度對政黨體系的影響，及提出相關改革建議。最後，亦有針對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選制選擇進行探討的研究（Hsieh, 1999）。

理論上關於 SNTV 選制比例性的探討，分別有超比例性（superproportional）、次比例性（subproportional），及比例性介於「單一選區（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與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以下簡稱為 SMD 制及 PR 制」，等幾個主張。持超比例性主張者，之所以認為 SNTV 選制具有超比例性，不外從政黨選舉操作的角度出發，認為因為大黨相較於小黨在此一選制下，將面臨更嚴峻的提名（超額、低度提名）、選票配置等問題的困擾。所以，不是發生較多的提名、配票失誤，就是傾向保守，因此造成對大黨不利而小黨有利的情況（Lijphart, Lopez Pintor and Sone, 1986；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註二）。另一方面，持次比例性主張者，認為 SNTV 制下小黨和大黨同樣面臨提名（超額、低度提名）、選票配置等問題的困擾。但大黨有較多的資源可以進行協調，進而降低這些因提名（超額、低度提名）、選票配置等問題所造成的困擾，尤其是執政大黨更能解決這些困擾，相對地，小黨則較無解決提名（超額、低度提名）、選票配置等問題的能力。所以，在 SNTV 選制下，大黨相對於小黨更有超額獲利的能力，故此一選制是次比例性（subproportional），也就是對大黨有利、對小黨不利（Cox and Niou, 1993；Cox, 1996）。除此之外，亦有學者從選制本身的機械性特性探討，主要認為 SNTV 制的比例性介於 SMD 與 PR 兩種選制之間，且選區越大比例性越彰顯（謝復生，1992）。由以上幾種對於 SNTV 選制比例性的探討，我們不難發現在理論上，由於分別在選舉操作困擾的認定不同，及由制度的機械特性出發進行探討，所以造成在 SNTV 選制比例觀點有所歧異。

除了理論上的探討以外，關於比例性方面的實證研究，所指出的是處於此一選制下的大型政黨，確實有較高的超額獲利（Cox and Niou, 1993；黃德福，1994；徐永明、陳鴻章，2002）。在針對日本、台灣的研究中發現，日本的自民黨（LDP）、台灣的國民黨（KMT）皆有超額獲利，且選區規模越小超額獲利越高（註三）。然而，之所以

會有有利於執政大黨的結果，不外是因為擁有政策制定優勢的執政黨，可以克服提名、配票等困擾，且因為其他在野的大黨無法克服提名、配票等困擾，所以自然造成有利於執政大黨的結果（Cox and Niou, 1993）。而在針對台灣所進行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指出對於大黨（國民黨、民進黨）有利，但在選區規模與政黨超額獲利上，呈現J型發展。亦即大黨的超額獲利情況，隨選區規模擴大而降低，但在選區規模超過9席之後，大黨的超額獲利情況隨選區規模擴大而增加（黃德福，1994）。另一方面，在徐永明、陳鴻章（2002）對於台灣地區所進行的研究指出，國民黨與民進黨確實有超額獲利情況，只是隨政黨發展與學習歷程階段的不同，而有高低不一的超額獲利（註四）。所以，由過去理論與實證研究，我們可以發現：SNTV 選制確實賦予較大型政黨有較高超額獲利可能，且隨選區大小不同而有所差異。

除了關於比例性的研究外，國內對於 SNTV 選制的研究，主要在於 SNTV 選制對候選人的選舉行為、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在 SNTV 選制對於候選人的選舉行為、政黨政治影響的探討上，多認為 SNTV 選制對於競選風氣、政黨政治有不良的影響，且建議加以改革以利我國政治運作的良性發展（王業立，1991、1999；Hsieh, 1996）。而在選制對於政黨體系發展的影響方面，主要認為由於 SNTV 選制的比例性介於 SMD 與 PR 間，且選區越大比例性越彰顯（謝復生，1992）；所以，相較於 SMD 選制，此一選制有利於小黨生存及多黨體系的發展。同時，在實證研究上，台灣地區於立委選舉結果所呈現的有效政黨數目，由1989年1.92個有效政黨數，至1998年成長為2.48個有效政黨數（王業立，2001）。是故，SNTV 選制雖然賦予大型政黨較大的超額獲利可能，但此一選制亦同時賦予小黨生存空間。

在政黨選舉操作的研究方面，則是針對特定選區，研究國民黨如何進行動員，以最大化席次（Liu, 1999）。在 Liu（1999）的研究主要針對於國民黨（KMT），1980～1995年間在台北市，如何運用責任區制有效建立動員網絡。Liu 指出此一選舉動員機制，在1992年後逐漸受到來自民進黨、新黨的衝擊，而選舉失利的主要原因為過度提名。除了個案研究外，徐永明（2002）嘗試以較長時序、較廣泛地針對我國兩大主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在提名行為與選舉超額獲利表現上進行研究。徐永明指出：政黨如何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學習的可能，而不同的處境亦影響政黨的學習與成效。

除了針對政黨研究之外，亦有對於選民在不同選制下投票行為的研究（黃秀端，2000），其主要運用不同選制下的民調資料，及國內政黨得票情況，來分析不同選制下選民的策略投票行為。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較為少見的為制度選擇的探討（Hsieh, 1996），其主要透過選制特色及政治氣候變化，來探討為何在民主化過程中，威權獨大政黨（國民黨）會有 SNTV 與 PR 混合制的制度選擇。

由過去關於 SNTV 選制研究文獻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SNTV 選制於制度面，確實有利於大黨且亦賦予小黨生存空間。而這樣的選制特性，同時亦反映在處於此一選制下的大黨確實普遍有較高的超額獲利，但亦有利於多黨體系發展。然而，這樣的選制特性，是否也意謂著：越能防止分裂或能有效進行合作的政黨，將會有較高的超額獲利，而持續分裂的政黨是否因此有不利的影響。並且這樣的選制特性，在實際的政黨政治發展上，又造成什麼影響呢？對於此，我們嘗試以1983~2001年間，七屆區域立委選舉為例進行研究與探討。

肆、第三黨對國民黨的影響

自八〇年代中，主導台灣政經發展數十年的獨大政黨（國民黨），首度面臨來自選區及議會中，組織性反對勢力（民進黨）的挑戰，更於九〇年代中、二〇〇〇年及二〇〇一年，面對來自黨內分裂的衝擊。除了分裂之外，在二〇〇一年的立委、縣市長大選，政黨的選舉合作議題首度發起，且持續延燒到二〇〇二年的北、高市長大選。泛藍（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泛綠（民進黨、台聯）的對抗及跨越政黨分際的選舉合作議題，頓時成為現實政治關注的焦點。

那麼，接下來我們首先回顧自八〇年代中起，區域立委選舉中一系列的政黨分裂與崛起，並藉此初步探討政黨分裂所造成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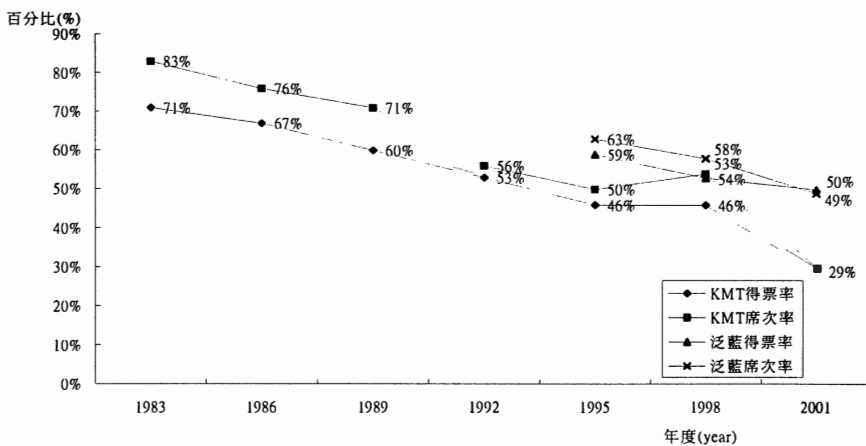


圖1 國民黨及泛藍區域立委選舉得票及席次比例圖（1983~2001）

如圖1所示，由於新興政黨的崛起，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持續受到衝擊。民進黨於

八〇年代中突圍成功，然而當年度國民黨的得票率僅有些微下降，這反映的是八〇年代中民進黨的得票，主要來自獨立候選人的整合。但隨民進黨得票的成長，國民黨於八〇年代末得票率，相較於八〇年代初，下降一成左右。而新國民黨連線成員，於九〇年代初出走，至九〇年代中新黨正式投入立委選戰，國民黨得票相較於八〇年代末，出現將近一成五的降幅。雖然，新黨自九〇年代中起，得票率逐漸下挫，但國民黨的得票率卻未有上揚，隨後親民黨（PFP）及台聯黨（TSU）於二〇〇一年投入選戰，國民黨更出現歷年來最大的得票率降幅。相較於八〇年代初的高得票率，國民黨於二〇〇一年區域立委選舉的得票率僅兩成九，降幅高達四成二；同時，這也反映在高達五成四的席次率降幅。明顯地，反對黨的崛起及來自黨內的分裂，對於一黨獨大的國民黨造成莫大的衝擊。

除了國民黨的發展之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自九〇年代中起，在得票率發展上，亦呈現下跌的趨勢。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得票率自九〇年代中起，於每個選舉年度皆出現4%~6%的降幅，至二〇〇一年得票率首度降至五成。而在席次率方面，同樣於每個選舉年度皆有不小的降幅，至二〇〇一年僅獲得四成九的席次率。這樣的情況所反映的，不外是除了國民黨於得票及席次率逐年下降外；同時，泛藍作為一個整體，不論在選票市場或席次獲得上，皆呈現萎縮的情況。除了得票及席次率的觀察外，那麼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席次紅利的表現又是如何呢？雖然，得票及席次率皆呈現下降的情況，但由席次紅利表現，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選票轉換為席次時的超額獲利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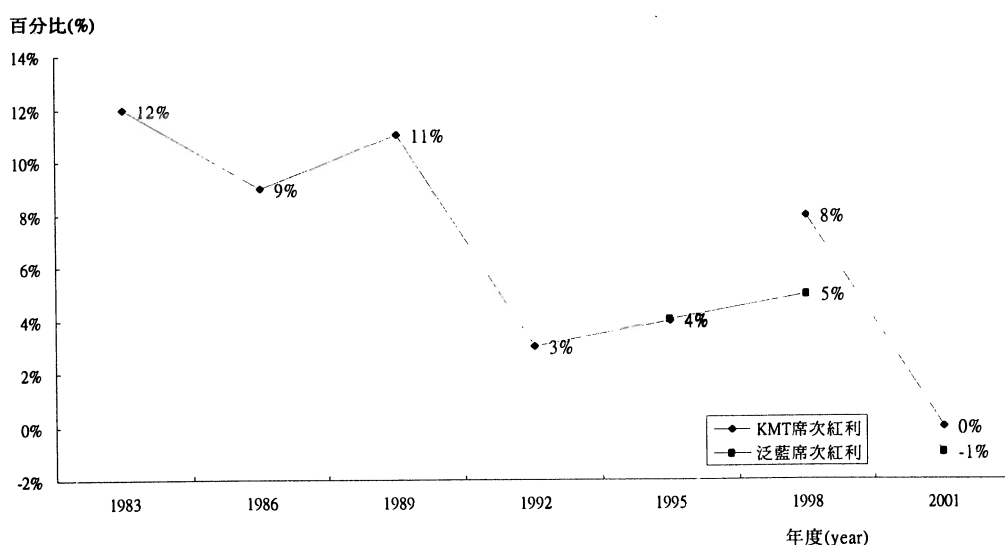


圖2 國民黨及泛藍區域立委選舉席次紅利比例圖（1983~2001）

如圖2所示，國民黨於八〇年代普遍享有高額席次紅利，最高的一年曾高達一成二（1983年）。而自八〇年代中民進黨成立，雖然國民黨在席次紅利表現略有下降，但亦高達一成左右。若對照圖1，雖然國民黨的得票及席次率皆呈現下降的趨勢，但由其席次紅利依然居高不下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八〇年代的民進黨，對於國民黨在得票轉換為席次過程中，獲取超額獲利所造成的影響並不顯著。這也同時意謂著，八〇年代的民進黨，對於國民黨所造成的挑戰相當微弱。之所以如此，我們可以由新興政黨成立之初，由於選舉經驗及動員能力的有限，且國民黨有較多選舉經驗及組織動員能力獲得解釋（徐永明、陳鴻章，2002）。

然而，國民黨於九〇年代後，在席次紅利上的表現，則遠不如八〇年代。國民黨僅於九〇年代末，再次出現將近一成的高席次紅利，而其餘年度的席次紅利僅介於0%～4%之間，其中又以二〇〇一年席次紅利為零，為歷年來最低。這所反映的，不外是選舉賽局的競爭更為劇烈，且國民黨於九〇年代後，在得票轉換為席次過程中，獲取超額獲利的能力亦有所變化。一方面，隨賽局競爭對手民進黨選舉經驗的增加，國民黨所面臨的挑戰隨之加劇。另一方面，面臨持續的黨內分裂，除了得票率不斷下跌之外，選制所賦予的優勢亦有所減損。所以，國民黨在遭受選舉賽局中不斷加劇的挑戰，及黨內分裂的雙重影響下，在席次紅利上的表現，自然無法如八〇年代一般強勢。

接下來，除了國民黨席次紅利的探討以外，我們將觀察重心轉向將泛藍政黨視為一個整體。如圖2所示，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席次紅利的表現上，在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〇年初，最高席次紅利為5%，而二〇〇〇年初席次紅利為負1%。若對照圖1，我們不難發現，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得票率於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〇年初，介於五到六成左右，但相較於得票率較低的國民黨，這樣的席次紅利表現，可說是相當不理想。這所反映的，不外是分裂的泛藍陣營，在得票轉換為席次的過程上，即使有較多的得票，但超額獲利的能力卻不如國民黨。所以，在分裂的情況下，即使有較多的得票及選制所賦予的優勢，依然無法有相對優異的實質表現。那麼，面對分裂的泛藍陣營及持續受到衝擊的國民黨，選舉賽局的主要競爭者民進黨，其表現如何呢？以下，以圖3呈現民進黨歷年來的選舉表現並討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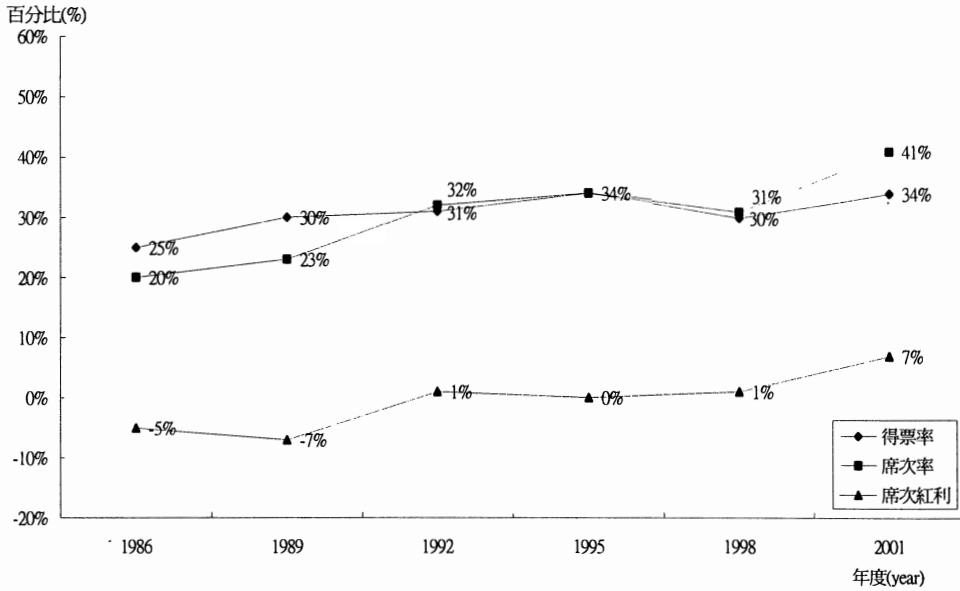


圖3 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得票、席次、席次紅利比例圖（1986～2001）

如圖3所示，民進黨得票率呈現初期成長，隨後則維持平穩。民進黨的得票率於成立初期，由兩成五成長至三成，隨後，則穩定維持於三成至三成四之間（1989～2001年）。而在席次率方面，民進黨於八〇年代僅能獲得兩成多，至九〇年代則穩定維持三成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二〇〇一年，出現歷年來最高的席次率。另一方面，民進黨在席次紅利表現上，八〇年代皆出現低度代表的情況（負的席次紅利），直到九〇年代，才逐漸擺脫低度代表的窘境，且於二〇〇一年獲得7%的席次紅利，並首度超越國民黨。這所反映的是，一個經驗不足的新興政黨，於投入賽局的初期勢必付出可觀的學習成本（徐永明、陳鴻章，200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於九〇年代後，得票穩定維持於三成至三成四之間，但卻能於2001年一舉獲得高達7%的席次紅利，這樣大幅度的超額獲利成長，除了其本身的能力有所提升外，泛藍陣營的內部紛擾亦為重要因素。

是故，由以上對於國內政黨政治發展情況的初步探索，我們可以發現，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於八〇年代雖然面臨組織性反對勢力（民進黨）的挑戰，但由於民進黨在選舉經驗的不足及組織動員能力的有限。所以，對國民黨所造成的挑戰，並不強烈。然而，進入九〇年代，隨反對政黨（民進黨）逐漸能擺脫低度代表窘境，及新興第三黨自國民黨分裂，一黨獨大的國民黨不但在得票及席次率表現不如八〇年代，且普遍獲得高額席次紅利情況亦不復已往。尤其，於二〇〇一年國民黨在得票、席次及席次紅利上的表現，更為歷年最不理想。明顯地，在九〇年代，新興政黨的崛起，對國民黨所造成的衝

擊遠大於八〇年代，且隨著泛藍陣營不斷的分裂，反對政黨（民進黨）亦因此有更大的超額獲利空間。

伍、分裂政黨的選舉行爲與表現

那麼，除了對於總體發展的觀察外，我們進一步將關懷的焦點轉移到，同屬於泛藍範疇的國、新、親三黨，其提名、當選、席次紅利表現及有無效票比率的變化。透過此一觀察與探討，我們可進一步深入了解，九〇年代以來，獨大的國民黨如何因應來自黨內的分裂，及選票動員能力是否有所變化，且同屬於泛藍範疇的國、新、親三黨，各別及作爲一個整體的選舉表現如何？

表1 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新黨、親民黨之提名、當選、席次紅利比例（1992~2001）

政黨	年度	1992	1995	1998	2001
國民黨	提名率	0.97	0.78	0.64	0.54
	當選率	0.58	0.64	0.84	0.53
	席次紅利	0.03	0.04	0.08	0.00
新黨	提名率	-----	0.29	0.21	0.19
	當選率	-----	0.46	0.19	0.03
	席次紅利	-----	0.00	-0.03	-0.02
親民黨	提名率	-----	-----	-----	0.33
	當選率	-----	-----	-----	0.59
	席次紅利	-----	-----	-----	0.02
泛藍	提名率	-----	1.07	0.85	1.06
	當選率	-----	0.59	0.68	0.46
	席次紅利	-----	0.04	0.05	-0.01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92~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註：所謂提名率（ $\text{提名率} = \text{政黨提名數} / \text{總應選名額}$ ）、當選率（ $\text{當選率} = \text{政黨當選數} / \text{政黨提名數}$ ）、席次紅利（ $\text{席次紅利} = \text{政黨席次比例} - \text{政黨得票比例}$ ），而泛藍是將國民黨、新黨（1995年、1998年）；國民黨、新黨、親民黨（2001年）視爲一個整體加以估算。

如表1所呈現的，國民黨持續向下修正其提名率，從九〇年代初九成七的提名率，以一成五左右的幅度逐年向下調整，若對照圖1，不難發現是基於得票率下降及因應來

自黨內的分裂。在新黨方面，除了九〇年代中出現將近三成的提名比率外，其餘年度僅兩成左右的提名比率。而在二〇〇一年，首度參與選舉賽局的親民黨，則有三成三的提名比率。除了國、新、親各自的提名表現外，我們亦可發現九〇年代中及二〇〇一年，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皆出現超過100%的超高額提名。這樣的高額提名，對於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所造成的影響，就反映在席次紅利獲取上的失利。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間，在高額的提名情況下，席次紅利最高為5%，而在二〇〇一年，泛藍陣營在五成左右的得票基礎上，進行高達106%的提名，所造成的後果是負席次紅利的情況。明顯地，在政黨分裂的情況下，提名率的調節呈現失控，尤其，是在新興政黨首度投入選舉賽局時。而且提名率調節的失控，亦反映在泛藍陣營，於超額獲利獲取上，呈現不理想的表現。

在當選率方面，國民黨的當選率，從九〇年代初起持續攀升，更一度於九〇年代末達到高峰，但於二〇〇一年降至五成三，為九〇年代以來最低的當選比例。在新黨方面，除了於九〇年代中，曾出現四成六的高當選率外，其餘年度皆未達兩成，尤其在二〇〇一年，新黨的當選率更僅有3%。相對地，這一年首度參與選舉賽局的親民黨，則有六成左右的當選率，為泛藍政黨中最高的當選率表現。除此之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九〇年代中出現接近六成的當選率，更於九〇年代末攀升至七成左右，但二〇〇一年則出現兩成二的降幅，當選率降至五成以下。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於九〇年代中，首度面臨新黨分裂的挑戰，但其當選率表現相較於九〇年代初，反而表現優異。這樣的情況，可由九〇年代初，已有部分新國民黨聯線成員由國民黨出走，故國民黨在九〇年代中，以大幅調降提名率因應。所以，雖然面臨黨內的分裂，但依然可以適度調節。

然而，二〇〇一年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國民黨於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失去了中央執政權，隨後再次面臨黨內分裂危機，親民黨的崛起及對於選票市場的錯估，造成國民黨出現歷年來最嚴重的挫敗。雖然，在二〇〇一年的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進行提名率調降，但卻無法適度配合選票市場的萎縮；同時，亦表現為歷年來最低的當選率。這樣的情況，若進一步與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當選率進行比較，我們不難發現，泛藍陣營由於高度的提名率，造成其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的當選率表現，皆遠低於國民黨及親民黨的當選率。尤其，在二〇〇一年立委選舉中，在五成左右的得票基礎下，卻進行高達106%的提名，所反映的亦是歷年最低的當選率。

在席次紅利表現上，國民黨的席次紅利從九〇年代初逐年上揚，並於九〇年代末達到高峰，但於二〇〇一降至歷年來最低。在新黨方面，除了九〇年代中席次率能適度反應得票率外，其餘年度皆呈現低度代表的情況（負席次紅利）。除此之外，於二〇〇一年首度投入選舉賽局的親民黨和國民黨一樣，僅獲得些微的席次紅利。而泛藍作為一個

年首度投入選舉賽局的親民黨和國民黨一樣，僅獲得些微的席次紅利。而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九〇年代中期及末期皆維持於4%~5%的席次紅利，但二〇〇一年呈現負席次紅利。由席次紅利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面臨分裂衝擊的國民黨，僅九〇年代末有優異的表現，其餘年度皆未有突出的表現。在新黨方面，由於選票市場持續大幅萎縮，故反映的是持續的負席次紅利。而首度參與選舉賽局的親民黨，亦僅有些微的席次紅利。另一方面，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席次紅利發展，其席次紅利皆由國、親所獲得，且相較於民進黨二〇〇一年立委選舉，以三成四的得票率獲得7%席次紅利，但泛藍陣營高達五成左右的得票率，卻出現負席次紅利的情況。明顯地，分裂的情況下，對於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確實有實質的不利影響。

由以上國、新、親及泛藍加總起來的提名、當選及席次紅利發展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當同屬泛藍陣營的個別政黨，在政黨得票規模差距縮減且從事有限選票市場下席次競爭時，所可能出現的困境，尤其，當選票市場進一步萎縮，所造成的傷害更不在話下（註六）。

除了對政黨提名行為、當選比率、席次紅利發展，進行探討之外。接下來，我們嘗試運用有效動員指標，對於面臨分裂的獨大政黨（國民黨）及第三黨進行選票動員情況變化的觀察。所謂有效動員指標，主要欲測量政黨選票動員與配置能力的變化，此一指標與提名率、當選率、席次紅利等指標，主要的差異在於，其所觀察的為政黨在選舉操作上的選票動員及配置能力。而提名率、當選率、席次紅利等指標，所觀察的是政黨於選舉初期的提名操作，及所反映的選舉結果。所以，透過有效動員指標的測量，我們可以了解，獨大政黨是否因為黨內的分裂，造成選票動員能力的變化。且新興第三黨的選票動員能力又是如何？而同屬泛藍範疇的各政黨的選票動員能力，又是如何變化。

表2 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新黨、親民黨之浪費、無用、無效、有效票比例(1992~2001)

政黨	年度	1992	1995	1998	2001
國民黨	浪費比率	0.02	0.03	0.04	0.02
	無用票比	0.29	0.21	0.11	0.32
	無效票比	0.31	0.24	0.15	0.34
	有效票比	0.69	0.76	0.85	0.66
新黨	浪費比率	----	0.01	0.02	0.00
	無用票比	----	0.27	0.56	0.96
	無效票比	----	0.28	0.58	0.96
	有效票比	----	0.72	0.42	0.04
親民黨	浪費比率	----	----	----	0.04
	無用票比	----	----	----	0.22
	無效票比	----	----	----	0.26
	有效票比	----	----	----	0.74
泛藍	浪費比率	----	0.03	0.04	0.02
	無用票比	----	0.22	0.17	0.32
	無效票比	----	0.25	0.21	0.34
	有效票比	----	0.75	0.79	0.66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92~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註：表2所運用的各種指標計算原則如下：浪費票比率（政黨選區當選者超過安全票數和/政黨總得票）、無用票比率（政黨選區落選者得票和/政黨總得票）、無效票比率（政黨浪費票比率+政黨無用票比率）、有效票比率（1-政黨無效票比率），以上指標為有效動員指標，其詳細討論，請見徐永明、陳鴻章，2002，「老狗學把戲：立委選舉政黨提名的有效性」，東吳政治學報，十五期：87~121。

如表2所呈現的，國民黨在浪費票比率上，九〇年代初至二〇〇一年間，並沒有明顯的變化，皆能維持在2%~4%之間。同樣的，新黨、親民黨亦無嚴重的浪費選票，而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同樣呈現低度浪費選票的情況。在無用選票方面，國民黨於九〇年代初期至末期，無用選票比率持續下降，但在二〇〇一年則大幅上揚。在新黨方面，則是自九〇年代中起，無用票快速攀升，至二〇〇一年竟高達九成六。另一方面，在二〇〇一年首度參與選舉賽局的親民黨，亦出現兩成二的無用票比率，而泛藍作為一個整體，九〇年代中期至末期略有下降，但同樣在二〇〇一年大幅攀升。

由這樣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雖然面臨來自黨內的分裂，但過度動員情況並無顯著的變化，這樣的情況表示：國民黨雖然持續的分裂，但組織動員能力依然強

勢。而新黨同樣在過度動員上無顯著的變化，且親民黨亦無嚴重的過度動員情況，值得一提的是泛藍做為一個整體，亦無明顯過度動員，這反映的是泛藍整體並未因為分裂而出現嚴重的過度動員。另一方面，若就無用票、提名、席次紅利發展觀之，我們不難發現國民黨在九〇年代，由於提名率的持續調降，故能有效的降低無用票比率且促使席次紅利上揚，但二〇〇一年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高提名率，造成的是無用票的大幅攀升，及席次紅利的下挫。所以，雖然泛藍陣營持續的分裂，但不論是泛藍範疇下的個別政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皆未因分裂而有明顯的過度動員。但若就無用票的變化及提名比率觀之，明顯地，過度提名造成無用票的攀升且反映在席次紅利的萎縮，尤其以二〇〇一年最為嚴重。

陸、席次紅利的形成與變化

在初步了解八〇年中起，台灣地區區域立委選舉中，反對勢力的整合與獨大政黨的發展情況後。接下來，我們所要關懷的是，處於 SNTV 選舉賽局中的競逐者，其席次紅利的形成、變化與其提名、配票等行為的關係為何？以下，先從資料編整進行簡要說明。

一、資料說明

本文在席次紅利的形成與變化的迴歸分析上，對於所採用的資料，主要欲說明的有資料範圍、變項建立、資料判別與運用等。在資料範圍方面，本文所採用的資料為1983~2001年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於複數選區的得票與當選情況資料。所以，本文所採用的資料，並不包括山地、平地山胞、僑選立委，及僅一席應選名額的選區，且資料之建構與分析單位，亦是以複數應選名額選區為單位（註七）。

在變項建立方面，本節主要探討政黨選區提名、配票等失誤和席次紅利形成與變化的關係。所以，欲建立之變項有(一)席次紅利、(二)超額提名、(三)低度提名、(四)配票失敗等幾個變數，其中以席次紅利為依變數，而其他三個變數為自變項。以下，分別簡要說明各變項的計算原則。(一)席次紅利：政黨選區席次比例－（減）政黨選區得票比例。而在超額提名、低度提名、配票失敗等幾個變項建立上，主要以選區為單位運用 Droop quota $[V / (N + 1) + 1]$ 為基準，進行政黨最高可當選數估算，同時此一數值亦為政黨之預估正確提名數，然後，配合超額提名、低度提名、配票失敗之判斷原則，進行是否發生失誤的判斷。這三個變項之判斷原則分別為，(二)超額提名：政黨選區提名額－

(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正值，且政黨當選數低於正確提名額，此視為該選區為超額提名。(三)低度提名：政黨選區提名額 - (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負值時，此視為該選區為低度提名。(四)配票失敗：政黨選區提名額 - (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零時，且政黨當選數低於正確提名額，此視為該選區為配票失敗(註八)。

在資料判別與運用方面，在提名認定上，只要是該黨候選人，不論是正式提名、推薦、報准參選，其得票、所獲席次，皆認定為該黨得票與當選數，而在第三黨方面，主要包括有新黨、親民黨及台灣團結聯盟。另一方面，在選區失誤判別上，主要可分為超額提名、低度提名及配票失敗三類失誤。在第三黨之失誤計算上，並不將新黨、親民黨及台灣團結聯盟之得票、席次進行加總，而是分別以個別政黨以選區為單位，進行失誤判別，然後，再進行失誤選區的比對與總失誤數的計算。亦即，若是三個政黨於同一選區，皆發生超額提名的失誤，則判定於此一選區有一個提名失誤，若僅一個政黨或兩個政黨，於同一選區有超額提名，亦判定為此一選區有一個提名失誤情況，但若是這三個政黨於同一選區分別有不同的失誤情況，則分別判定於同一選區各出現一個不同的提名失誤。除此之外，在第三黨之得票與席次及席次紅利之計算上，則採用將新黨、親民黨及台灣團結聯盟合併之原則進行估算。而在國民黨與民進黨方面，則沒有如第三黨採用席次、得票及席次紅利合併原則，而失誤採分離原則的估算情況。以下，以表3分別呈現，各黨超額提名、低度提名、配票失敗等三個變項的建立情況。

表3 各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各類失誤比例表(1983~2001)

政黨	超額提名	低度提名	配票失敗	失誤總數	失誤比例	選區總數
國民黨	28	1	10	39	0.30	128
民進黨	18	5	14	37	0.31	119
新黨	7	0	0	7	0.10	72
親民黨	7	0	0	7	0.28	25
台聯	2	0	0	2	0.08	25
第三黨	12	0	0	12	0.17	72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83~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註：表3所呈現的第三黨，是依本節所述的原則將新黨、親民黨及台聯進行加總後的結果。

如表3所示，各政黨主要的選區失誤，皆是以超額提名為主，而在低度提名與配票失敗方面，國民黨及民進黨皆有發生，但以民進黨較為嚴重(註九)。由此，亦可初步

了解民進黨提名策略上較為保守，且選票動員與配置能力亦相對不足，而在國民黨方面，其超額提名情況，明顯較民進黨嚴重，128個選區出現28個選區超額提名。另一方面，三個新興政黨同樣都有超額提名的情況，其中又以親民黨的超額提名比例較高，然而，若是將三個新興政黨的失誤進行加總，其總數共為12個選區發生超額提名。明顯地，三個政黨於2001年區域立委選舉複數選區中，於其中四個選區皆發生超額提名的失誤。那麼，這些提名、配票等失誤對於各政黨席次紅利形成與變化，有何影響呢？以下，以表4呈現迴歸分析的結果。

二、分析發現

表4 席次紅利的形成與變化表

	模型一 (國民黨的席次 紅利為依變項)	模型二 (民進黨的席次 紅利為依變項)	模型三 (第三黨的席次 紅利為依變項)
國民黨超額提名	-.213***	.083***	.038***
國民黨低度提名	-.248***	0.051	-0.003
國民黨配票失敗	-.149***	.062***	0.001
民進黨超額提名	0.017	-.105***	0.024
民進黨低度提名	-0.020	-.093***	-0.001
民進黨配票失敗	.074***	-.139***	0.023
新興第三黨超額提名	0.004	.071***	-.103***
截距	.092***	.023***	-.019***
R-square	0.553	0.569	0.407
N	128	128	128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83~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 $p < .05$

從上表截距係數的比較可以得知，過去歷次立委選舉中，國民黨的席次紅利比民進黨與新進的第三黨為高，而其中又以新興政黨的席次紅利為負向，代表其得票率與席次率的顯著差距。至於個別政黨席次紅利的形成與變化而論，國民黨歷次選舉席次紅利最易因為低度提名而受到龐大的席次損失，高達兩成以上，其次為過度提名，至於配票失敗的影響較輕微但仍屬顯著，高達一成五。除了本身提名失誤的影響外，他黨提名行為對於國民黨席次紅利增減的影響，以民進黨的配票失敗較為顯著，只要民進黨在一個複數選區配票失敗，就能為國民黨在該選區帶來9%的席次紅利，當然這個幅度與國民黨

本身提名失誤的影響相較，仍是輕微。

至於民進黨，本身提名失誤的影響以超額提名與配票失敗最大，但是造成的紅利損失在一成左右，與國民黨提名失誤比起來算是較輕微，同時國民黨的提名失誤顯然對民進黨席次率的增加有相當的助益，當在個別的複數選區，國民黨超額提名的失誤會增加民進黨在該選區的紅利8%，而當國民黨配票失敗會增加民進黨6%的席次紅利。值得注意的是，當新興政黨的提名數超額時對國民黨席次紅利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對民進黨卻有7%的增長。

至於第三黨席次紅利的變化，雖然是負數的趨勢，但是當國民黨在該複數選區有提名超額的失誤時，除了民進黨會有席次紅利的增長外，第三黨整體而言也會有少許的助益，而當第三黨提名超額時，顯然民進黨是最大的贏家，而第三黨本身是輸家，有高達一成的席次紅利損失，至於國民黨則不受影響。因此，提名行為影響的不僅只其本身的表現，更影響競爭政黨的選舉表現。

柒、無失誤的模擬

在初步了解八〇年代中起，區域立委選舉中一系列的政黨分裂與崛起的發展，且透過迴歸分析了解，選舉賽局各參與者間選區提名失誤與席次紅利獲得的交互影響後。接下來，我們所要問的是，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error free）而其他政黨提名表現不變的情況下，國民黨、泛藍整體將會有怎樣的表現呢？透過無選區失誤情況的模擬，我們可以評估在分裂的情況下，除了提名行為、席次紅利變化、有無效票發展情況外，更進一步，了解無失誤情況下的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表現，及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的可能處境（註十）。接下來，我們先對無失誤模擬的方法進行說明。

一、模擬方法

在無失誤情況模擬方法上，其基本假設是：在其他政黨表現不變的情況下，參與選舉賽局的國民黨或泛藍做為一個整體，完全沒有在任何選區發生失誤，此即是無失誤表現。在台灣區域立委選舉中，長期採用 SNTV 制，所以，因選區規模大小不同帶給得票規模不同的政黨，制度面的優勢與限制（謝復生，1992）。所以，較大型的政黨，在沒有提名誤差的情況下，可以隨選區大小而獲得高低不一的制度性獲利，但政黨亦面臨提名、配票等困擾（Cox and Niou, 1993）。是故，選舉賽局中的政黨若在完全沒有提名、配票失誤的情況下，除了可以反映選區規模大小，所賦予得票規模不同政黨的優勢與限制外；同時，亦可因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的失誤而有所獲利。所以，若是參與選舉

賽局的各別政黨，能克服 SNTV 選制所造成的提名、配票等困擾，且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那麼將可達到選票的有效運用，且獲得更多超額獲利。

在失誤計算上，是以選區為基本單位，而失誤計算主要依據模擬當選數進行失誤與否判斷。以下，分別簡述模擬當選數設算，及無失誤模擬。在模擬當選數設算指標上，當我們假設：政黨可以完全克服 SNTV 選制所造成的提名、配票困擾時，我們同時假設政黨能完全調配選票，在此情況下，政黨將可有效運用選票，達到模擬情況下的可當選數。所以，席次分配的商數，即為此一模擬的基本設算指標。此一基本設算指標，所考量不外是能符合 SNTV 選制特性，且能合理的估算當選數，故在考量使用 SNTV 選制下，易形成 $N + 1$ 位主要競爭者 (Reed, 1990; Cox, 1994, 1997; Hsieh、Niemi, 1999)，我們以 Droop quota 進行政黨可當選數估算 (註十一)。而在無失誤模擬方面，由於欲評估國民黨及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情況下，若能達成無任何選區失誤，將會有何選舉表現。所以，在可當選數估算後，我們進一步以選區為單位與政黨實際表現進行比較，並估算失誤選區數及失誤類型 (Cox and Niou, 1993; 徐永明、陳鴻章, 2002)。最後，透過失誤選區的更正，我們可以估算出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的情況下，其可增加的當選席次數目 (註十二)。且在可增加當選席次數目估算後，我們即可模擬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無選區失誤模擬下，可達成的模擬表現為何？

在資料的運用與判斷上，在國民黨得票估算方面，並不僅計算正式提名候選人得票，也就是，在得票估算上，只要是該黨候選人，不論是推薦、報准參選或正式提名，皆併入該政黨得票。除了國民黨無失誤情況模擬外，亦可將同一範疇不同政黨的得票合併，進行無失誤情況模擬，且由於本文所欲探討為分裂處境下政黨，若是能充分合作，所可能達到的最適情況。所以，其分析時點為 1995~2001 年，而估算之基本資料為同屬泛藍陣營的國、新、親之得票總和。當然，以泛藍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無失誤模擬，其存在的基本假設不外是，在同一範疇的不同政黨存有有效協調機制，能夠克服 SNTV 選舉賽局中的提名、配票等困擾。同時，不論是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失誤模擬，其基本上都在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的情況假設下，進行一系列的失誤估算、更正及可增加席次的模擬。

最後，透過此一指標的運用，我們可以進行(1)無失誤情況模擬：在最適情況模擬方面，我們運用 Droop quota，以選區為單位，分別估算政黨的最適提名數及可能當選數，並進行失誤選區數估算，且進一步透過失誤選區的更正及可增加席次的估計(2)表現差異：透過無失誤情況模擬與實際情況的比較，我們即可了解實際表現和無失誤情況的差異(3)其他參與者可能發展：透過各別政黨無失誤的估算，我們亦可推估其他選舉賽局

多席次選舉中政黨的分合：以台灣區域立委選舉為例

參與者的可能發展。以下，我們以二〇〇一年區域立委選舉，台南縣、高雄市南區、南投縣及花蓮縣為範例，進行模擬的示範。

表5所呈現的是二〇〇一年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及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實際及模擬情況下的提名、席次、席次紅利比率。台南縣、高雄市南區、南投縣及花蓮縣的應選席次，分別為八席、五席、四席及兩席的大、中、小型選區，其 Droop quota 約為 $1/9 = 0.11$ （台南縣）、 $1/6 = 0.17$ （高市南區）、 $1/5 = 0.20$ （南投縣）、 $1/3 = 0.33$ （花蓮縣）。而國民黨的模擬可當選席次數目，台南縣（四席）、高市南區（一席）、南投縣（一席）、花蓮縣（一席）。當求出可當選數後，即可估計出最適提名率、席次率及席次紅利，同樣地，其他政黨的模擬，也可依此法算出。且進一步，透過和實際表現的比較，我們可以評估提名失誤選區數，及透過失誤更正求出可增加席次數（註十三）。

表5 2001年區域立委選舉：台南縣、高雄市南、南投縣、花蓮縣選區之國民黨、泛藍模擬

政黨 (失誤別)	選區 (席次數)	得票率	實際			模擬			模擬與實際差(模擬-實際)		
			提名率	席次率(數)	紅利	提名率	席次率(數)	紅利	提名率	席次率(數)	紅利
國民黨											
(超額)	台南縣(8)	0.40	0.75	0.25(2)	-0.15	0.50	0.50(4)	0.10	-0.25	+0.25(+2)	+0.25
(超額)	高市南(5)	0.25	0.60	0.00(0)	-0.25	0.20	0.20(1)	-0.05	-0.40	+0.20(+1)	+0.20
(配票)	南投縣(4)	0.39	0.50	0.25(1)	-0.14	0.50	0.50(2)	0.11	0.00	+0.25(+1)	+0.25
(超額)	花蓮縣(2)	0.38	1.00	0.00(0)	-0.38	0.50	0.50(1)	0.12	-0.50	+0.50(+1)	+0.50
泛藍											
(超額)	台南縣(8)	0.47	1.00	0.38(3)	-0.09	0.50	0.50(4)	0.03	-0.50	+0.12(+1)	+0.12
(超額)	高市南(5)	0.40	1.00	0.20(1)	-0.20	0.40	0.40(2)	0.00	-0.60	+0.20(+1)	+0.20
(無失誤)	南投縣(4)	0.51	1.00	0.50(2)	0.00	0.50	0.50(2)	-0.01	-0.50	0.00(+0)	-0.01
(超額)	花蓮縣(2)	0.66	2.00	0.50(1)	-0.16	1.00	1.00(2)	0.34	-1.00	+0.50(+1)	+0.50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如表5所示，國民黨於二〇〇一年區域立委選舉，在應選席次八席的大型選區台南縣的得票率為四成，實際提名率高達七成五，高於其最適提名率兩成五，而其當選率及席次紅利的表現，和模擬情況差距分別為兩成五，且席次差距為兩席。而在應選席次五席及四席的中型選區高雄市南區及南投縣方面，高雄市南區為超額提名，所造成的是負兩成五的席次紅利，亦和模擬席次紅利有兩成的差距及一席的席次差距。而在南投縣方面，國民黨所呈現的為配票失誤的情況，在此一選區國民黨的提名率和模擬提名率相同，但席次率則和模擬情況有兩成五的差距，同時反映在兩成五的席次紅利差異，及一

個席次數差。另一方面，在選區席次僅兩席的花蓮縣，國民黨有三成八的得票率，在模擬情況下可獲得一席，但其實際提名率卻高達100%。所以，反映零當選率、負三成八的席次紅利、五成的模擬與實際紅利，及一個席次數的差距。由國民黨的實際表現和模擬情況差距，我們不難發現，超額提名、配票失敗為四個不同規模選區存在的失誤情況，且由於超額提名、配票失敗，造成相當的席次紅利差距及可當選席次的損失。

除此之外，就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而言，不論在台南縣、高市南區、南投縣或花蓮縣，其實際提名情況，都遠超過模擬最適，除了南投縣外，其餘選區實際席次紅利表現皆低於最適情況（台南縣，12%；高雄市南區，20%；花蓮縣，50%）。而值得一提的是，當選區規模縮減，政黨分裂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更為明顯。以花蓮縣為例，在模擬情況下，泛藍作為一個整體，以六成六的得票將可獲得所有席次，但實際上，泛藍陣營僅獲得一席。由以上模擬，我們可以得知政黨在分裂情況下，由於政黨規模的縮減，容易造成因選票的不足及割裂，而成為SNTV制的選制偏差受害者，且在提名率遠超過模擬最適情況下，造成可能獲得席次的損失與競爭政黨的相對獲利。

在無失誤模擬完成後，接下來，我們可以判斷各政黨是否有選區失誤，及可以增加的席次數目。由表5，我們可以判斷，國民黨於台南縣、高市南區、南投縣及花蓮縣，皆為失誤。所以，如果能更正這四個選區的失誤，分別可增加席次，在台南縣（兩席）、高市南區（一席）、南投縣（一席）及花蓮縣（一席），共可增加五席。另一方面，若將國、新、親三黨視為一個整體，我們可以發現，有三個選區為失誤選區，而在錯誤更正後可增加席次為三席。如以上的模擬方法，我們可以以選區為單位，分別進行無失誤模擬，然後僅更正失誤選區，並進行可增加席次數的估算，且可在加總後求得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無失誤情況下的模擬表現。

二、國民黨、泛藍的無失誤模擬

以上一節的模擬方法及程序，我們依選區為單位進行無失誤模擬並加總後，我們即可得到如表6所呈現的國民黨及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無失誤情況下的模擬表現。以下，分別探討在無失誤情況下，國民黨及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在區域立委選舉將會呈現的選舉表現。

表6 國民黨、泛藍區域立委選舉實際表現、Error Free 模擬表 (1995~2001)

政黨	年度	得票率		實際			模擬			模擬與實際差(模擬-實際)		
		提名率	席次率(數)	提名率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提名率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提名率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國民黨	1995	0.46	0.78	0.50(61)	0.04	0.56	0.56(68)	0.10	-0.22	+0.06(+7)	+0.06	
	1998	0.46	0.64	0.54(90)	0.08	0.56	0.56(94)	0.10	-0.08	+0.02(+4)	+0.02	
	2001	0.28	0.54	0.29(48)	0.00	0.35	0.35(58)	0.07	-0.19	+0.06(+10)	+0.07	
泛藍	1995	0.59	1.07	0.63(77)	0.04	0.70	0.70(86)	0.11	-0.37	+0.07(+9)	+0.07	
	1998	0.53	0.85	0.58(97)	0.05	0.63	0.63(105)	0.10	-0.22	+0.05(+8)	+0.05	
	2001	0.49	1.06	0.49(82)	-0.01	0.55	0.55(93)	0.06	-0.51	+0.06(+11)	+0.07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95~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如表6所示，國民黨在無失誤情況下，其得票率若維持於四成六，皆可獲得一成的席次紅利，即使在二〇〇一年得票降至兩成九，亦可獲得7%的席次紅利。這樣的情況，所意謂的是，在SNTV選制中，若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的情況下，能有效避免提名、配票等失誤，即使得票大幅度下降，依然可以獲得可觀得席次紅利；但同時也反映，即使在無失誤情況下，得票的大幅下降，亦造成席次紅利的降低。然而，若對照其實際表現，我們不難發現九〇年代末，為最接近無失誤模擬的一年，實際紅利和模擬紅利僅有些微的差距，而九〇年代中及二〇〇一年，則有不小的席次紅利差距，這反映的不外是，在這兩個選舉年度國民黨由於失誤，造成席次損失的上揚。若進一步觀察其實際提名率的變化，國民黨於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間，皆以一成到一成五的幅度調降，但和模擬提名率比較，三個年度中以1998年和模擬提名率最為接近，僅8%的差距，這同時也反映在，實際紅利和模擬紅利的貼近。所以，若能有效的控制提名幅度，對於國民黨在席次上的競逐及超額獲利的取得，確實有相當的助益（註十四）。

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方面，其在實際提名率發展上，九〇年代中及二〇〇一年皆有超過100%的超高提名率，僅於九〇年代末較低，而在席次率發展上，則是逐年下降，由九〇年代中的六成三降至二〇〇一年的五成左右。另一方面，泛藍做為一個整體，其席次紅利於九〇年代中期、末期，維持在4%~5%的水平，但在二〇〇一年出現負席次紅利。這樣的發展情況，若對照得票、提名及席次率的變化，我們不難發現九〇年代中期、末期，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得票、席次率皆下降的情況下，由於提名率的大幅調降，依然可以維持一定的席次紅利，但二〇〇一年，在得票率下降的情況下，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卻進行大幅提名，所以造成的是席次、席次紅利的下跌。

除了了解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實際表現外，我們亦可由表6發現，泛藍作為一個整

體在模擬最適的提名率上，隨得票率的下降，確實有向下調整的必要。同時，此亦反映在席次比率的下降，而在席次紅利方面，同樣隨得票率的下跌而有所降低。接下來，我們若比較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實際表現與模擬最適，我們可以發現，實際提名率確實和最適提名率，呈現大幅度的差距（22%～51%）。而在席次紅利表現上，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間，實際紅利和模擬紅利有相當的差距。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大幅度的實際與模擬提名率差距，對於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確實造成席次紅利競逐上的傷害。並且，由模擬的席次紅利差距，我們亦可得知，若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能充分合作，將可在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的情況下，獲取11%～6%的席次紅利；這也意謂，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若能充分合作確實可以有效增加超額獲利，及擴張可當選席次數。

那麼，除了對於國民黨及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實際表現與無失誤模擬，進行比較外。接下來，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即是：若是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能充分合作，其他選舉賽局的參與者將會有如何的表現呢？亦即，泛藍範疇下個別政黨的合作，對於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所造成的影響如何？且其他選舉賽局的競逐者中，何者受到最大的影響呢？

捌、泛藍「完全合作」下的政治影響

在進行國民黨及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失誤模擬後，接下來我們可以同樣以選區為單位，進行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情況下，其他政黨選舉表現的模擬。透過此一模擬，我們即可了解，泛藍範疇下個別政黨完全合作下的政治影響。以下，以表7呈現加總的結果，並討論之。

表7 泛藍 Error Free 情況下其他政黨表現情況表（1995~2001）

政黨	年度	得票率	實際		泛藍 Error Free		模擬與實際差(模擬-實際)		
			提名率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民進黨	1995	0.33	0.57	0.34(41)	0.01	0.26(32)	-0.07	-0.08(-9)	-0.08
	1998	0.30	0.46	0.31(52)	0.01	0.28(47)	-0.02	-0.03(-5)	-0.03
	2001	0.34	0.46	0.41(69)	0.07	0.37(62)	0.03	-0.04(-7)	-0.04
台聯黨	2001	0.08	0.21	0.05(8)	-0.03	0.05(8)	-0.03	0.00(-0)	0.00
獨立	年度	得票率	參選率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席次率(數)	席次紅利
	1995	0.08	0.93	0.03(4)	-0.05	0.03(4)	-0.05	0.00(-0)	0.00
	1998	0.17	0.96	0.11(19)	-0.06	0.10(16)	-0.07	-0.01(-3)	-0.01
	2001	0.09	0.86	0.04(7)	-0.05	0.03(5)	-0.06	-0.01(-2)	-0.01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95~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如表7所示，在實際表現方面，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間，民進黨的得票率介於三成至三成四，變動幅度並不大，在提名率上，以九〇年代中的五成七最高，隨後則有一成的降幅，並持續維持在四成六，而在席次率方面，介於三成一至四成一之間，有一成的變動幅度。同時，這也反映在席次紅利的大幅變動，在九〇年代中期及末期，民進黨幾乎無席次紅利，但二〇〇一年卻獲得高達7%的席次紅利。而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情況下，民進黨所呈現的模擬席次率有逐年上揚的趨勢，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席次率差距高達一成，而席次紅利亦由-7%上揚至3%，也有一成的成長幅度。由民進黨實際表現，及其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情況下的模擬表現，同樣在席次、席次紅利有一成左右成長，我們可以得知民進黨在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間，在區域立委選舉有顯著的成長。這樣的成長可由民進黨在九〇年代，隨選舉經驗的增加與學習，而能有效的降低提名失誤獲得解釋（徐永明、陳鴻章，2002）。除此之外，民進黨的實際表現與泛藍無失誤情況下表現，又有什麼差異呢？

民進黨在席次率與席次紅利表現上，在實際表現與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模擬情況下，於1995~2001年三個選舉年度中，又以95年所呈現的差異最為明顯，不論在席次率與席次紅利，皆有將近一成的落差。這樣的差異所反映的是：當泛藍範疇下的所有政黨能充份合作，且民進黨又無法有效控制提名幅度，將造成民進黨在選舉賽局中，出現嚴重的低度代表情況，同時有大量的席次損失，由表7所呈現的模擬及實際席次數差，即高達九席之多。然而，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選舉賽局中得票市場的下降，及民進黨在提名幅度的降低，我們可以發現1998~2001年，即使泛藍範疇下的所有政黨能充分

合作，對民進黨所造成的影響幅度亦隨之下降，但還是可以造成3%~4%的席次率、席次紅利差，及五到七席的席次損失。

所以，由以上民進黨的實際、模擬，及模擬與實際差異表現的發展情況，我們可以由模擬與實際席次紅利差距，皆呈現負值的差距，了解到民進黨的實際表現皆優於模擬情況，且即使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情況下，民進黨的席次紅利表現亦呈現逐年上揚的趨勢。這所意謂的不外是，泛藍範疇下的所有政黨能充分合作，對於民進黨的影響下降；同時，可由民進黨本身提名率的向下調節，及模擬與實際席次紅利與席次率間差距的縮短，了解民進黨本身亦有所成長。

除了民進黨以外，在二〇〇一年首度投入選舉賽局的台聯，其得票率為8%、席次率為5%、席次紅利為-3%，而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情況下，台聯的席次率、席次紅利，並沒有不同。所以，這代表的是泛藍範疇下的所有政黨充分合作並不影響台聯，但由其呈現負席次紅利的情況，我們不難發現 SNTV 選制下，雖然小黨有生存空間，但依然是處於被剝削的處境。

在獨立候選人方面，在九〇年代中至二〇〇一年間，其得票率約一至兩成左右，但參選率卻高達八到九成，這樣的高參選率，同時反映在-5%~-6%的席次紅利表現。這樣的情況，亦反映獨立候選人由於缺乏協調，及有力的組織運作，所以，即使有一到兩成左右的得票，但依然是長期的席次紅利貢獻者。若對照其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情況下的模擬表現，模擬和實際紅利差距，最高僅有-1%的差距，我們可以說：泛藍範疇下的所有政黨充分合作，對於獨立候選人僅有些微的影響。

是故，由以上的模擬我們可以發現，泛藍範疇下的所有政黨若能充分合作，受到最大影響的為民進黨。而值得一提的是，民進黨在九〇年代中及二〇〇一年皆有三成四的得票率，但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情況下，民進黨於二〇〇一年，可獲得3%的席次紅利，遠高於其在九〇年代中的席次紅利一成。這樣的情況，除了反映出民進黨在選舉提名及配票能力上的進步；同時，亦證明處於 SNTV 選制下的競逐者，其能否獲得超額獲利，除了自身在提名、配票等困難的克服外，其他賽局參與者的分裂與合作亦為關鍵因素（註十五）。

玖、研究發現與結論

在透過有無效指標的測量、國民黨與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失誤模擬，及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處境模擬後，本文有以下發現。

一、政黨分裂與合作的制度誘因

過去關於 SNTV 選制的文獻，在此一選制對於政黨體系發展影響的探討上，主要認為由於此一選制比例性介於 SMD 與 PR 間，且選區越大比例性越彰顯。所以，相較於 SMD 選制，在 SNTV 選制下，小黨有其生存空間（謝復生，1992）。且在實際的發展上，學者亦指出，我國於立委選舉結果所呈現的有效政黨數目，亦由1989年1.92個有效政黨數，至1998年成長為2.48個有效政黨數（王業立，2001）。

另一方面，在 SNTV 選制比例性的探討上，亦有學者認為對於較大型政黨有利（Cox, 1996），且在實證研究上亦指出，處於此一選制下的大型政黨確實有較高的超額獲利（Cox and Niou, 1993；黃德福，1994；徐永明、陳鴻章，2002）。所以，在理論與實際發展上，SNTV 選制是有利於小黨崛起及多黨體系的發展。同時，此一選制於制度上，對於大黨亦賦予較高的超額獲利可能性。然而這樣的選制特性，也意謂著，選制本身同時具有政黨分裂與合作的誘因。

在本文的研究即發現，首先，同屬泛藍範疇的各政黨，失誤選區主要集中於中小型選區。以下，以表8呈現泛藍範疇的所有政黨於1995~2001年間，在85個應選名額一席以上選區中的失誤情況及比例。

表8 泛藍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失誤選區重複情況表（1995~2001）

選區大小	選區數	失誤選區數	失誤選區比例	重複選區數	重複比例
1	13	0	0.00	0	0.00
2~5	32	12	0.38	4	0.33
6~9	27	13	0.48	5	0.38
10~13	12	0	0.00	0	0.00
16~17	1	0	0.00	0	0.00
Total	85	25	0.29	9	0.36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95~1998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如表8所示，依選區大小進行分析，本文發現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1995~2001年間，平均失誤比例為29%。而失誤主要集中於中小型選區，其中6~9席應選名額的選區，失誤比例高達四成八，且在失誤重複率上，以6~9席應選名額的選區較為嚴重。這反映的是，同屬泛藍陣營的政黨於中小型選區，較容易發生失誤，同時也意謂，泛藍陣營的分裂，於中小型選區造成主要的席次損失。

其次，在本文亦發現，一黨獨大的國民黨，確實持續受到黨內成員出走另組政黨的衝擊。這明顯地是因為小黨有生存空間，所以，有利於既有政黨成員的出走，且同時這樣的誘因，亦成為既存政黨可能的分裂因素。

最後，透過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失誤模擬，我們亦發現若政黨能充分合作，將可有較高的超額獲利。這一方面證明，選制賦予較大型政黨較高的超額獲利可能性；同時，透過此一模擬，我們亦可發現，SNTV 選制除了存有政黨分裂誘因外，亦於制度面存有政黨合作的誘因。但分裂與合作的制度誘因，在時序上有所差異，所以，造成政黨在分裂與合作上有學習時序上的落差。由於選制賦予小黨生存空間，有利於既有政黨成員的出走，而立即的席次回應亦使政黨易於分裂。然而，分裂所造成的席次損失，及因分裂而使其他參與者獲利，往往是在損失形成後逐漸被分裂政黨重視。是故，在立即的生存空間爭取，及共同創造更高利益之間，往往形成一種時序上的落差及損失的形成。除此之外，透過泛藍無失誤情況下，其他政黨表現的模擬，我們亦發現，處於此一選制下的競逐者，若能有效防止分裂或充分合作，將越能於此一選制下獲利，反之，則越處於不利的地位。

二、分裂與合作對政黨的影響

透過近十餘年來，台灣地區區域立委選舉中，各政黨的發展與表現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獨大政黨除了面臨反對勢力的影響，更進一步面臨來自黨內分裂所造成的衝擊。獨大的國民黨於得票率持續下降的情況下，席次率亦隨之下降，尤其，來自黨內的分裂，主要的獲利者為未分裂的反對政黨。並且透過迴歸分析，我們可以了解，由國民黨分裂的新興第三黨過度提名時，民進黨為最大贏家。

另一方面，透過泛藍的無失誤模擬，我們亦可發現，若分裂政黨能充分合作，將可有效的提高席次率，同時增加席次紅利的獲取。而泛藍的合作，對於民進黨有最大的影響，對於無黨籍參與者有些微的影響，但對於台聯則沒有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處於 SNTV 選制下的政黨，分裂確實造成較具規模未分裂政黨的獲利。反之，若政黨能防止分裂或充分合作，即可於選舉賽局中獲取較高的超額利益。是故，處於 SNTV 選舉賽局的政黨，若要能獲取較高的利益，除了失誤的降低外，有效的合作或防止分裂亦相當重要。

三、反事實模擬訊息與理性選擇悲劇的克服

(一)短視的理性，還是有限的理性

透過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失誤模擬，我們發現二〇〇一年同屬泛藍的國、新、親

多席次選舉中政黨的分合：以台灣區域立委選舉為例

各政黨，並無法在區域立委選舉形成實質的合作。這樣的情況可由模擬與實際提名及席次紅利的高度差距，得知國、新、親不但沒有控制提名比率，反而是在有限的選票資源下，進行高度的提名與競爭。相較之下，同屬泛藍範疇的各政黨在二〇〇〇年的縣市長選舉，及二〇〇一年的北高市長選舉，則有明確的合作，並沒有進行如同區域立委選舉一般的相互競爭。

之所以，同屬泛藍的個別政黨，在縣市長及北高市長選舉能進行合作，但在區域立委選舉卻無法合作，不外是因為不同選制下，所提供的誘因及訊息有效性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在縣市長及北高市長選舉賽局中，賽局參與者明確了解選票集中的重要性，同時選民亦有相當的動機及訊息進行策略性投票。所以，即使在選票資源分配極度不對等、及不穩定的情況下，合作共識依然較有落實的可能性。相較之下，在區域立委選舉賽局中，同一範疇的各政黨，所面對的是多席次的競爭賽局，政黨即使了解合作可以帶來較高的共同獲利，但問題是當處於得票資源分配上的極度不均等，及選票瓜分穩定度不足的情況下，所造成的即是同一範疇的個別政黨，提名額度分配前題無法形成的困境（註十六）。並且台灣地區的立委選舉制度，同時採行以區域立委選舉得票超過5%門檻，即可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的PR制度，更形成政黨嘗試提高提名額度爭取可能選票的誘因。

所以，在區域立委選舉中，因為得票資源分配上的極度不均等，及選票瓜分穩定度不足的情況下，造成合作前提無法形成，同時制度又提供不分區席次分配誘因的情況下，即使存有合作認知，但卻難以實質進行合作。相反地，卻是形成各自嘗試爭取可能獲得席次的增加，但卻造成更為相對不利的處境與其他競爭者的相對獲利，這樣的情況可說是：有限訊息下的理性選擇，所造成的悲劇。

（二）反事實的模擬與合作的誘因

無失誤模擬除了明確地證明了，同屬泛藍範疇的個別政黨，在區域立委選舉並無進行如單一席次選舉的合作，且造成重大的席次損失，及其他賽局競爭的相對獲利之外。此一反事實的模擬，亦可為SNTV選制下，跨越政黨範疇合作，提供有益的訊息與可能的合作機制。在SNTV選制下，之所以會造成理性選擇的悲劇，主要因素不外是訊息的有限性，進而使賽局中的行為者無法跳脫有限訊息下的理性選擇失敗。然而，當反事實模擬可以明確的證明分裂的不利影響，及可能的合作利益時，此即成為跨越政黨範疇合作的形成，提供有利訊息。

除此之外，隨選舉經驗的增加，及同一範疇的個別政黨所瓜分的選票比例趨於穩定，無失誤模擬方法所採用的最高可當選數估算方法，亦可成為跨政黨選舉合作的提名估算方法。在無失誤模擬方法中，採用被稱為安全門檻的Droop quota $\lceil V / (N + 1) \rceil$

+1) 進行最高可當選數估算。這樣的估算方式，可說是相當保守的可當選數估算，而且可以是一個相當保守的提名額度估算方式。雖然此一提名額度估算方式較為保守，但在無失誤模擬中，我們可以發現：只要規模較大的政黨依此方式進行提名，即可確保選制所賦予的優勢，進而獲得一定的超額獲利。所以，只要同一範疇的個別政黨，依此方式估算共同最高提名額度；並且依各自於選票市場所瓜分的得票比例為提名額度分配的基準，勢必可以有效的運用 SNTV 選制所賦予的優勢，進而獲取更多的超額獲利。

* * *

投稿日期：92.01.02，修改日期：92.05.09，接受日期：92.12.13。

附錄一：無失誤模擬的方法

本文主要透過無失誤模擬，進行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充份合作情況的模擬，及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情況下，其他選舉賽局競逐者表現模擬。以下分別說明，此一模擬之基本假設、試算指標，及估算過程等重要原則。

一、基本假設：

本文進行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無失誤模擬，其基本假設為：在其他政黨表現不變的情況下，參與選舉賽局的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任何選區，完全沒有發生超額、低度提名及配票失敗等失誤，此即是無失誤表現。同時，這樣的基本假設，亦假設政黨可以克服提名、配票等可能出現的失誤。所以，在這樣的假設下，並不因個別候選人間的差異，而造成政黨配票的困擾，而且同屬泛藍政黨集團的個別政黨間，亦存有有效協調機制，能協調個別政黨間的提名額度及選票配置。

在此基本假設下，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能在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的情況下，達成完全無失誤。亦即，這樣的模擬意謂國民黨可以完全克服提名、配票等可能困擾，而泛藍作為一個整體亦可達成充分合作。同時，透過這樣的無失誤模擬，亦可估算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其他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的情況下，最大超額獲利可能空間。且透過與實際表現比較，我們可以了解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若能充分合作將和實際表現有何差異？除此之外，我們亦可在無失誤模擬情況下，進一步估算若泛藍政黨集團下的個別政黨能充分合作，那麼，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受到影響如何？是故，透過此一無失誤模擬，除了可以了解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合作效益外，同時，亦可得知泛藍合作對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的影響。

二、無失誤模擬程序：

在無失誤模擬程序上，我們首要說明的為此一模擬的整個程序，在無失誤模擬上，我們首先要估算的為，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歷次選舉（1995～2001年），失誤選區數目及失誤類型，而選區失誤與否及失誤類型的估算，主要依選區為單位，配合其得票比率以 Droop quota $[V/(N+1)+1]$ ，進行最高可當選數估算。在最高可當選數估算完成後，再與實際當選情況、提名數，進行失誤類型判斷，當失誤選區及類型判斷完成後，我們即可初步確定每一個年度失誤選區及失誤所造成的席次損失。在初步完成每一個年度失誤選區，及失誤所造成的席次損失後，接下來，我們可進行失誤選區錯

誤更正，以求得無失誤情況下，確切的可增加席次數。此一失誤更正，主要以模擬最高可當選數為基準，進行失誤選區更正，同時進行各失誤選區當選情況的調整與模擬。

在失誤選區當選情況的調整與模擬上，是以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選區模擬最高可當選數為除數，國民黨、泛藍選區總得票為被除數，求出模擬最高可當選數的平均得票數。在平均得票數求出後，再和選區其他參選者實際得票情況進行比較，即可求得無失誤情況下，確切可當選數，同時，亦可估算出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每一錯誤選區更正後，受到主要影響的賽局參與者及可能減少席次數目。在進行失誤選區當選情況的調整與模擬後，我們即可確定國民黨、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在其他競逐者表現不變情況下，無選區失誤，所可以增加的席次數目，及其他競逐者將會減少的席次數目。

三、試算指標：

在基本假設、模擬程序簡介後，接下來，我們有必要說明此一模擬的基本試算指標。本文進行無失誤模擬的基本設算指標，為最高可當選數估算指標，在此我們運用 Droop quota 進行最高可當選數估算。Droop quota 亦有學者稱之為安全票數，即處於 SNTV 賽局的競逐者若能超越此一票數，就可確定當選無虞（王業立，2001）。但運用此一基準進行最高可當選數估算，亦存有缺陷，因為於實際情況下，往往無需達到此一基準即可當選。所以，以 Droop quota 進行最高可當選數估算，似乎有低估可當選數的疑慮，故本文於模擬試算指標探究上，除了 Droop quota 外，亦嘗試運用實際門檻、經驗門檻（ $V/2M$ ）等幾個基準進行最高可當選數估算（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林繼文，1999）。

於本文所進行的無誤模擬，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於第一階段，以最高可當選數進行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失誤模擬，並初步估算可增加當選席次數目，在第二階段，進一步進行失誤選區更正，與其他競逐者席次數減少估算。所以，在最高可當選數估算指標的找尋上，一方面除了能配合第一階段估算外，更重要的是要能適切的與第二階段估算配合。因為，於第一階段初步估算失誤選區，及可能增加當選數目後，於第二階段，確切估計可增加當選數，及其他賽局參與者可能席次減少數時，能否合理的進行其他競逐者席次減少，及可增加席次確定，即成為最高可當選數估算指標是否適用的關鍵。是故，於第二階段進行可增加席次確定，及其他政黨席次減少的估算時，必須能和實際選舉情況進行比較，且合理的確定可增加席次，及估算其他競逐者將減少的席次數。以下分別以表 A、表 B，呈現三個試算指標，於第一及第二階段之估算情況。

表 A 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第一階段各種指標模擬失誤選區數、可增席次數表

年度	Droop quota		實際門檻		經驗門檻	
	失誤選區數	可增席次數	失誤選區數	可增席次數	失誤選區數	可增席次數
1995	13(48%)	13(11%)	22(81%)	47(39%)	24(89%)	67(55%)
1998	9(31%)	10(6%)	20(69%)	66(39%)	26(90%)	83(49%)
2001	11(38%)	11(6.5%)	25(86%)	68(40%)	27(93%)	81(48%)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95~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如表 A 所示，以三種不同的基準進行選區失誤，及可增加席次數估算，我們可以發現，以 Droop quota 所估算的失誤選區數及可增加席次數，為三個設算基準中最低。其次，是以實際門檻所進行的估算，而又以經驗門檻所估算的選區失誤，及可增加席次數最高。之所以如此，不外因為 Droop quota 比其他兩個門檻高，所以，其所估算的泛藍最高可當選數目，比其他兩個門檻低。是故，在選區失誤估算相對偏低，同時，所估算的可增加席次亦較低。

而以經驗門檻 ($V/2M$) 所進行的估算，不論是在失誤選區數或可增加席次數皆比實際門檻高出許多，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由經驗門檻比實際門檻低，所以，以經驗門檻所估算的最高可當選數，亦高於其他兩個門檻。而進一步進行失誤選區，及可增加席次數評估時，自然呈現出高度的失誤選區比例，及可增加席次數。那麼，這三個不同的設算指標，所估算的錯誤選區數及可增加席次是否有意義呢？這將要配合第二階段模擬，以模擬情況和其他競逐者表現，進行比較以更正錯誤選區。若是，第一階段模擬中的錯誤選區及可增加席次數，能合理的進行更正與席次數增加，那麼，這意謂此一基本設算指標，所進行的選區錯誤及可增加席次數估算，是有意義的。反之，若無法合理進行選區錯誤更正，及可增加席次的增加，此即意謂，此一基本設算指標，所進行的評估並不合理，且不適合運用於此模擬。以下，我們以表 B 呈現第二階段模擬情況，並探討三種設算指標其合理性。

表 B 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第二階段各種指標模擬可更正失誤選區數、可增席次數表

年度	Droop quota		實際門檻		經驗門檻	
	可更正選區數	可增席次數	可更正選區數	可增席次數	可更正選區數	可增席次數
1995	9(33%)	9(7%)	8(30%)	8(6.5%)	1(4%)	1(1%)
1998	7(24%)	8(5%)	0(0%)	0(0%)	0(0%)	0(0%)
2001	9(31%)	9(5%)	6(21%)	6(3.5%)	3(10%)	3(2%)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中選會1995~2001年選舉實錄、聯合新聞網。

如表 B 所呈現的，分別以三種基準所估算的失誤選區及可增加席次數，於第二階段模擬，皆無法完全更正錯誤選區，且可增加席次數亦無法全數增加。但三個指標進行的估算，以 Droop quota 所估算的失誤及可增加席次數，其可更正比例及可增加席次數最高，而其他兩個設算基準，所估算的失誤選區及可增加席次數的可更正與席次增加比例卻相當低。這所反映的，不外是實際門檻及經驗門檻所進行的估算，於第二階段模擬出現嚴重的不合理情況。之所以如此，不外因為設算基準過低，所以造成於第二階段模擬時，無法合理的和其他競逐者實際表現進行比較及更正錯誤，同時亦表現在無法合理增加可增加席次數。明顯地，我們可以發現，三個基本設算基準所進行的失誤選區，及可增加席次數估算，於第二階段模擬，僅以 Droop quota 所進行的估算較為合理。所以，我們選擇以 Droop quota 為本文進行模擬的基本試算指標。

註 釋

- 註 一：在此我們所稱的泛藍、泛綠並非是一個實際存在的政黨，而是將選票基礎相近的政黨視為同屬一個政黨集團；並且進一步將同一政黨集團的個別政黨，視為一個整體加以探討並模擬。
- 註 二：所謂超比例性（superproportional）就是認為 SNTV 制下，在得票轉換成席次上，對於小黨有利，相反的對於大黨較為不利。
- 註 三：所謂超額獲利就是指得票與席次的不比例性，在完全 PR 的情況下，完全依得票轉換成席次比例，即無席次比例高於得票的情況，然而若有席次比例超過得票比例，即為超額獲利的情况。
- 註 四：在徐永明、陳鴻章（2002）的研究指出：民進黨在八〇年代普遍呈現低度代表的情況，但在九〇年代後逐漸隨提名失誤的降低而擺脫低度代表的窘境，且能有效的獲得席次紅利。相較之下，國民黨在八〇年代普遍獲得高席次紅利，但在九〇年代隨民進黨的成長及黨內的分裂，國民黨在席次紅利的獲取上受到嚴重的影響，且表現普遍不如八〇年代。
- 註 五：新黨於1995、1998及2001年，得票率分別為13%、7%、3%，呈現快速萎縮的情況。
- 註 六：於2001年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與親民黨得票差距僅一成左右，而且國、新、親（泛藍作為一個整體）又在50%的得票基礎上，進行高達106%的提名。
- 註 七：我國於區域立委選區規劃，於1983~2001年間，略有變化，於1983年除了北高兩市規劃為兩個選區外，於台灣省將兩到三個省轄縣市規劃為一個選區，共規劃為六個選區，而金門縣與連江縣，則規劃為福建省選區。自1986年後，選區規劃大致以縣市為單位規劃，亦有將同一縣市劃分為兩到三個選區的情況。
- 註 八：關於這三類失誤的詳細定義、判定原則及探討，請參考 Gary Cox and Emerson Niu, 1993,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 221-236. 及徐永明、陳鴻章，2002，「老狗學把戲：立委選舉政黨提名的有效性」，東吳政治學報，十五期：87-121。
- 註 九：國民黨在1992年的區域立委選舉，於南投縣選區發生低度提名的情況，這也是國民黨歷年來唯一的低度提名失誤。而民進黨則是，分別在1989年屏東縣選區、1992年高雄市第一選區及高雄縣選區、1995年宜蘭縣選區、1998年高雄市

第一選區等五個選區，發生低度提名的失誤。

註十：所謂無失誤，即是國民黨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於選舉賽局中，並沒有在任何選區出現過度提名、低度提名或配票失敗等失誤，此意謂國民黨能克服所有可能的失誤，或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能達成充分合作。

註十一：關於 Droop quota，請見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1989, *State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註十二：此一無選區失誤模擬，僅進行失誤選區數估算，且透過失誤選區的更正進一步估算可能增加席次數目。之所以，不進行全面可當選數估算，不外是因為本文欲模擬情況為，個別政黨若於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表現不變情況下，若能達成無選區失誤。個別政黨將可因無選區失誤及其他選舉賽局參與者失誤情況下，達到可能的最佳表現。

註十三：關於詳細的模擬試算及可增加席次評估，請見附錄一。

註十四：國民黨於1995及2001年間，實際提名率和模擬提名率的差距，分別為26%及17%。這兩個年度，實際紅利和模擬紅利差距在6%~5%。若進一步探究這三個年度，由於超額提名所造成的席次損失，在19席的席次損失中，因超額提名所造成的損失就佔16席之多。

註十五：由泛藍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失誤模擬，我們不難發現對民進黨有最大的影響，但由模擬亦可以發現，隨泛藍政黨集團整體的選票市場的萎縮，即使泛藍作為一個整體能達成無失誤，其合作效益亦隨之降低。反之，一個選票市場有一定穩定度或是擴張的政黨，如民進黨其選票市場自九〇年代持續維持在三成以上，其將可能進行有效的提名幅度調整，且有效提高選舉獲利。是故，我們可說當選票市場呈現大幅波動或萎縮，政黨將面臨更多的選舉操作難題，同時造成其在選舉賽局中的不利影響。

註十六：同屬泛藍政黨集團的國、新、親三個政黨，自九〇年代中，國民黨及新黨在選票資源分配上，呈現相當的不均等，且新黨得票情況亦快萎縮，而二〇〇一年首度投入選戰的親民黨，是一個選舉賽局的新進者。所以，在實質合作上面臨因有效訊息的不足，及參與者間選票資源分配極度不對等與不穩定，造成無法實質合作的困境。

參考書目

I . 中文部分：

王業立

- 1991 「我國現行中央民代選舉制度的理論與實際」，**政治科學論叢**，二期：135-152。
- 1999 「立委選舉制度改善之探討」，**理論與政策**，五十期：143-159。
- 2001 **比較選舉制度**，臺北：五南。

林繼文

- 1999 「單一選區兩票制與選舉制度改革」，**新世紀智庫論壇**，六期：69-79。

徐永明

- 2002 「立委選舉席次紅利的形成與變化」，世新大學選舉研討會，世新大學主辦，台北。

徐永明、陳鴻章

- 2002 「老狗學把戲：立委選舉政黨提名的有效性」，**東吳政治學報**，十五期：87-121。

黃秀端

- 2000 「選民的策略投票：單一選區與 SNTV 制度的比較」，台灣政治學會第七屆年會，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主辦，高雄。

黃德福

- 1994 「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台灣地區解嚴後選舉競爭的觀察」，**理論與政策**，七卷四期：3-21。

謝復生

- 1992 **政黨比例代表制**，台北：理論與政策雜誌社。

II . 英文部分：

Cheng, Tun-jen and Yung-ming Hsu

- 2002 “Strategic Voting, the Third Party, and a Non-Durvergerian Outcome: the March 2000 Elec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Chien-min Chao and Bruce Dickson. (ed.). *The Legacy of Lee Tung-hui*.

Cox, Gary

- 1994 "Strategic Voting Equilibria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608-621.
- 1996 "Is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uperproportional ?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3): 740-755.
-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x, Gary and Emerson Niou

- 1993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 221-236.

Hsieh, John Fuh-sheng

- 1996 "The SNTV System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Hung-Mao Tien. Armonk,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NY: M. E. Sharpe.
- 1999 "Manipulating the Electoral System under the SNTV: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n Bernard Grofman, Sung-Chull Lee, Edwin A. Winckler and Brian Woodall. (ed.) *Elections in Japan,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sieh, John Fuh-sheng and Richard G. Niemi

- 1999 "Can Duverger's Law Be Extended to SNTV? The Case of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18: 101-116.

Lijphart, Arend, Ragaël Lopez Pintor and Yasunori Sone

- 1986 "The Limited Vote and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Lessons from the Japanese and Spanish Examples." In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New York: Agathon Press. (ed.).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in, Jih-wen

- 1997 *Consequences of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ing Rule: Comparing the Japan and Taiwan Experiences*. Ph.D. dissertatio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iu, I-Chou

- 1999 “Campaign in a SNTV System: The Case of the Kuomintang in Taiwan.” In Bernard Grofman, Sung-Chull Lee, Edwin A. Winckler and Brian Woodall. (ed.). *Elections in Japan,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eed, Steven R.

- 1990 “Structure and Behaviour: Extending Duverger’s Law to the Japanese Ca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335-356.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arty Splitting and Cooperation under SNTV: A Study of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in Taiwan

Yung-ming Hsu* · Houng-chang Chen**

Abstract

To identify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party splitting and cooperation, this paper uses two kinds of indicators, nomination error free and effectiveness of vote mobilization, to estimate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pan-blue parties in legislative elections from 1995 to 2001.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if pan-blue parties had fully cooperated in these legislative elections, pan-blue parties would have gained more seat bonuses. However, in reality, the pan-blue parties' splitting has induced the loss of seat bonuses since the 1990s. The united DPP, on the other hand, has gained more seat bonuses,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ter-party competition of pan-blue camp. however, through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ew information of motivating inter-party cooperation under SNTV electoral system.

Key words: KMT, DPP, PFP, Party Cooperation,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

-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審查意見答覆

審委意見(一)

作者嘗試以台灣地區為分析對象，探討1983年至2001年期間，七次區域立法委員選舉結果，探討朝野政黨的得票率、席次率與席次紅利的消長情形。其中，泛藍陣營（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在1995至2001年期間的變動情形，更為本文的關懷焦點。

總體而言，本文具有若干優點。第一，分析架構可稱完整，作者行文亦頗見功力。第二，作者對於 SNTV 選舉制度相關研究文獻甚為熟悉，尤其著重 SNTV 選制比例性的三種論辯，切入角度相當具有說服力。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嘗試發展有效動員指標，測量政黨選票動員與配置能力的變化，儘管該指標可能仍有爭議，但確實為一個值得思考的面向。

儘管本文具有上述之優點，但是審查人以為，作者仍然未能適切地處理某些議題，甚至對於文獻資料的彙整有些偏失。因此，審查人建議貴刊採取「修正後再審」。假若作者能夠針對這些問題進行說明，修正若干缺失與爭議，則應能成為一篇頗具特色的期刊論文，為往後研究者普遍引用的著作。針對若干疑問，臚列如下：

- 一、文中多次強調，近年來，泛藍、泛綠陣營在民意代表與行政首長選舉，存有合作的共識與認知。這種說明與實際情形有所差距。尤其，作者重複提及，在 SNTV 選舉制度之下，同時存在著相互競爭與彼此合作的制度誘因，並且認為泛藍陣營表面上存有合作的共識與認知。作者的論述明顯有所爭議。就實際情形而言，泛藍、泛綠陣營政黨只有在單一席次的行政首長選舉過程中，包括2001年的縣市首長選舉與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才有合作的動機與意願，對於2001年立法委員及2002年北高市議員選舉，無論是泛藍陣營或是泛綠陣營的各個政黨均沒有合作的共識與認知。換句話說，作者所提出的陳述與事實並不吻合。
- 二、作者蓄意排除單一席次的行政首長選舉，主要探討 SNTV 對於政黨分合的影響，尤其是無法合作（提名、配票）、甚至分裂的主因，這是本文的主要關注。但是，就實際情形而言，不獨 SNTV 制度會產生類似的問題，在單一席次的行政首長選舉也會產生脫黨、違紀、同志鬩牆的局面，如台北縣、台中市、台中縣、台南縣、台南市、南投縣、高雄縣等百里侯選舉，均曾發生操戈對立的情形。也就是說，除了選舉制度的影響之外，是否有其他政治因素亦應納入考量，作者宜提出說明。
- 三、就理論層面來看，作者的論述有所疏失。本文一再強調，SNTV 選舉制度同時提供相互競爭與彼此合作的制度誘因，這種論述不無疑問。因為黃秀端、黃德福、游

清鑫、林繼文、謝復生、王業立、牛銘實和 Gary Cox 等 SNTV 研究者均指出，在 SNTV 幾乎必然導致「同袍相殘」，也就是說候選人主要的競爭對手並非來自於意識型態、立場較為疏遠的候選人，而是來自於意識型態、立場較為相近的候選人。簡單地說，理論上，SNTV 根本就無法提供彼此合作的制度誘因。

四、就可能情形來看，文中指出，政黨提名結果包括超額提名、適度提名、低度提名，然而多數 SNTV 研究者指出，政黨為了表示競選能力、彰顯選舉意圖和安排（撫）*aspirants*，實際上，只有超額提名和適度提名這兩種可能。然而，如作者在表3呈現，在1983年至2001年期間，國民黨曾經出現過1次低度提名，民進黨則有5次，這牽涉到「低度提名」的計算方式（p.141）是否符合學理依據，審查人建議作者將這些選區以註釋方式說明。

五、仍與前項問題有關，表4呈現，國民黨、民進黨「低度提名」均達到統計顯著，明顯影響席次紅利。但是，相對於超額提名的次數，低度提名次數甚少（尤其是國民黨），作者必須強調 *regression coefficient* 可能的偏差情形。

六、就實証結果（無失誤模擬）來看，作者的分析幾乎完全無法超脫現有文獻的論述：第一，在 SNTV 之下，提名、配票是問題癥結，致使分裂政黨進行高度的提名與競爭，無法充分合作；第二，在有限的選票資源下，合作獲益、分裂受害。審查人可以理解作者的觀點，但是問題不在於 *what* 而是 *how*：也就是說，作者至少必須提出「立場相近的政黨可能的合僱機制為何」，而不是「有限訊息之下，理性選擇的悲劇」（p.152），畢竟現有研究已經提出這種論點。

最後一個小問題，文中有若干錯字、疊字、漏字，希望作者再三審慎檢查。

審委意見(二)

本論文分析在 SNTV 制之下，台灣政黨的分合所造成的選舉效應。這是一個很有意義，但還沒有被仔細探討過的題目。作者充分運用了選舉結果的資料，提供了詳盡的探討，值得肯定。以下提出幾個問題給作者參考：

第一、一般而言，政黨規模越大選舉紅利越大，所以本文是否應先控制政黨大小再比較其紅利？頁134-135在比較國民黨和泛藍的紅利時，是否能將兩者視為兩個政黨進行比較？泛藍其實包含了國民黨和其它小黨，而後者的席次紅利本來就低，所以進行這種比較有欠合理。頁136-137比較泛藍各黨的席次紅利，也應考慮政黨大小。

第二、本文是運用 *Droop quota* 為基準計算過度或低度提名。但 *Droop* 是保證當選的門檻（即所謂 *exclusion threshold*），比實際上所需的門檻高很多，以此為準會高估過度提名（而這正是表3所呈現的）。作者在附錄中認為，實際門檻和經驗門檻所估算的失誤選區及可增加席次數偏低，以致出現「嚴重的不合理情況」。但

爲什麼估算偏低就不合理？事實上，在作者所引的（Cox and Niou, 1993）論文中，並沒有採用作者所列舉的任何一種方法。

最後是一些文字的修正：

- (1) 首頁感謝詞，「保貴」應爲「寶貴」。
- (2) 頁128行五，「以下簡稱 SNTV」應列於括弧內。
- (3) 頁128第二段第一行，「在台灣政黨政體系治發展……」？
- (4) 頁129最後一段第二行：「合作的不利因素」改爲「不利合作的因素」較佳。
- (5) 頁130第一行，「有 SNTV 選制……」應改爲「有此選制……」較順；首次出現 SNTV 時應註明英文全名。
- (6) 參考文獻沒有完全按照字母順序排列，有些地方沒有大寫，且欠缺（Liu, 1999）。
- (7) 頁136第二段，「同屬……變化」和後句重複。
- (8) 頁140第三段首行，「行成」應是「形成」。
- (9) 頁146最後一段第三行，「意謂」應是「意味」。
- (10) 註七與註十五重複。附錄一重複了本文的許多部分，可以更簡略。有許多地方的標點符號應修正，請作者細讀。

審委意見(三)

1. 年代寫法建議略作調整。

例：八零改成八〇、兩千零一改成二〇〇一、兩千零年改成二〇〇〇年 or 兩千年。

2. 其他不需修改。

論文評審意見的答覆

審委意見(一)之答覆

- 一、感謝評審的指正，我們已將文中語句不清之處進行修正。
- 二、關於本文將政黨分合議題，集中在區域立委選舉進行探討，我們主要期望能因爲焦點的集中，更能夠釐清選舉制度與政黨行爲間的關係。然而，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單一席次的縣市長選舉，這是不可否認且具有相當研究價值的議題。對於評審的建議，我們相當的感謝且是下一個努力的目標。所以，在本文中基於研究焦點的明確、篇幅的考量等，故我們僅探討台灣地區區域立委選舉中，政黨層次的分合與競爭。至於，單一席次選舉中的政黨分合、候選人行爲等，將是一個值得探討且持續

努力的目標。

三、關於 SNTV 選制是否能提供合作的誘因，本文即是透過反事實的模擬（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期能提供此一選制的制度性誘因的新資訊。

四、關於國民黨、民進黨發生低度提名失誤選區，已加入註八進行說明。然而，我們認為在政黨的提名行為中，可能發生的失誤不僅是超額提名，因為政黨在多席次選區進行提名時，所要考量的是能否獲得足夠的選票。所以，當政黨趨於保守時，將可能發生低度提名的失誤。同時，在學理上對於政黨提名失誤的探討中，Cox、Niou、Taagepera、Shugart 等皆認為政黨可能發生的提名失誤，將因為高估或保守，而出現超額提名或低度提名的失誤。而本文在提名失誤上，所採取的估算指標是被稱為安全門檻的 Droop quota，故並不會有高估政黨可當選數的可能。並且配合上「低度提名：政黨選區提名額 -（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負值時，此視為該選區為低度提名」進行低度提名的估算。所以，我們認為不論是在學理上，或是概念的實際操作化上，採取此一方式進行政黨提名失誤的估算，是具有其合理性與實質意義。

五、關於評審所提出的問題，我們認為並不會有這方面的偏差。

六、感謝評審的建議，我們已於本文結論的部分，進行關於 how 的探討。

審委意見(二)之答覆

一、關於是否進行政黨規模的控制，以利於席次紅利的比較。對於此一問題，我們認為政黨規模的差異，確實造成獲取席次紅利基礎的不同，但這並不對我們所欲進行的比較造成影響。相反地，就是因為政黨規模的差異，所以更能突顯出規模不同政黨所獲得的制度優勢與劣勢。並且配合模擬方法的建立與運用，我們更可以了解分裂政黨，因分裂所造成的不利。故不論是進行國民黨、泛藍的比較，或是泛藍陣營各政黨的比較，皆不會因為規模不同而無法比較。這樣的比較反而可以突顯，因規模的不同而能獲得的制度優勢與劣勢。且在進行無失誤模擬後，我們更可了解，各政黨是否有充分地運用其被賦予的制度面優勢。

二、對於是否高估過度提名，及無失誤模擬的估算門檻選擇問題，以下分別說明。首先，在運用 Droop quota 為基準，是否會高估過度提名，我們認為在配合超額提名的判斷原則後，並不會有高估的可能性。因為採用 Droop quota 為基準雖然會有較保守的可當選數估算，但只要配合判斷原則的運用「超額提名：政黨選區提名額 -（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正值，且政黨當選數低於正確提名額，此視為該選區為超額提名。」，高估超額提名的可能並不大。其次，由於無失誤模擬為兩階段的模擬方法。所以，當第一階段所估算出來的可增加席次數，於第二階段進行失誤選區更正時，若無法合理的進行失誤的更正，此即是第一階段所採用的估算門

檻並不合理。如附錄一所進行的模擬，雖然於第一階段 Droop quota 所估算的失誤選區數，及可增加席次數較低，但卻是三種估算門檻中，於第二階段可以確實進行更正的。相較之下，以其他兩種門檻所進行的估算，因為門檻較低，所以會有較多的失誤選區數，及可增加席次數。但在進行第二階段的失誤選區更正，及可增加席次數計算時，卻無法實際的進行失誤選區的更正。所以，在第一階段的估算門檻上，我們選擇以 Droop quota 為最高可當選數的估算基準。

以上，是我們對評審所提建議的回覆。最後，感謝三位匿名評審所提出的寶貴建議，及諸多文字、修辭等的指正。